臺大歷史學報第28期
2001年12月，頁157~174

BIBLID1012-8514(2001)28p.157-174

§綜合論述§

西方性別理論在漢學研究中的運用和創新

孫康宜*

當代西方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引起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增強了學術研究的跨學科性質。首先，它為文化批評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使我們對男女雙方的經驗有了較以前更為寬泛的了解，從而也在學院中引起了對知識重構的重視。透過性別含義的稜鏡，在重構既有知識之同時，也可對它作出重新闡釋，這正是性別研究的治學之道，即使把它置之傳統學術的領域，其應用也是很有效果的。著名漢學家Susan Mann有所謂「拿新眼光看熟面孔」（defamiliarizing the familiar）的說法，[1]要點出女性主義和性別理論在最近幾十年來的特殊成就，她這句話就是最合適的表述。

本文主旨就是希望談談近年來性別研究對漢學研究（Sinology。尤其是美國的漢學研究）的影響，尤其要討論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就是，西方的性別理論到底在哪些方面適用，哪些方面未必適用。同時我也想通過對中國傳統精神的討論，進一步提出新的闡釋性別的方法，藉以促進中西文化的會通。不必說，性別理論已對漢學研究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實際上已使沿襲下來的文本解讀方式受到了挑戰。而且，最近以來，學者們在性別關係問題上所做的大量研究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如果把西方的性別理論和漢學研究視為兩個相關的知識領域，則我

* 作者係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東亞語文系教授。

1 Susan Mann, "What Can Feminist Theory Do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 Brief Review of Scholarship in the U.S.," *Jindai zhongguo funu shi yanjiu*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 1 (6 Jun., 1993), 241~260. 參見拙作，〈老領域中的新視野〉（康正果譯），南京大學張宏生教授主辦，「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0/5/16~5/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更應當對於二者如何相關及其互相的關聯在文化上如何構成等問題，不斷地作出探問。

關於西方性別理論的興起和演進，是有一段漸進的發展過程的。為了簡單說明其中的來龍去脈，我還是要從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談起。那時候的先進婦女興起了一種叫做「提高意識」（consciousness-raising）的活動，簡稱為CR，那是一種自我界定的活動，其目的在於尋求婦女在當今和在歷史中的「聲音」（voices）。而這裏所說的「聲音」，不只包括婦女個人的「真正」聲音和主體性，而且也涉及她們互相不同和彼此挑戰的自我。[2]我認為，這種自我界定的活動可分成兩方面來談。首先要談所謂的激進女性主義；這就是尖銳地批判父權制、號召建立婦女自身性別路線的激進主義。如Betty Friedan和Kate Millett都是這一派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3]尤其是Millett的名著《性政治》曾在一九七〇年出版後引起了美國文化界的廣大反響，因為該書首先把傳統的文學寫作與解讀看成是一種有關政治和權力的性別主從關係。通過廣泛閱讀男性作家的文本，Millett發現自古以來的西方文學其實就是男性「厭女症」（misogyny）的發揮。[4]在婦女解放運動開始之時，這種極端的性別立場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女性還勢單力弱的情況下，把大男人作為她們的「敵人」來攻擊，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所以早期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排斥男性介入她們的爭論與活動。這樣激烈的態度和以女性自我為主的閱讀法則自然引起了不少傳統作家的反彈，但同時也引起了一些男性學者的同情。例如，以研究法國文學著稱的R. Howard Bloch就在其《中古的厭女症與西方浪漫情觀的興起》一書中採用了同情女性的閱讀視角——他認為中古西方所謂

2 Nancy F.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nd edition), xi~xii. 並見康正果，《女權主義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0~11。

3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Norton, 1963);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4 參見拙作，〈在耶魯看女性主義〉，收入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批判與重建》，「性別與中國」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2000），264~2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宮廷式愛情」和「聖母情結」表面上似乎在提高婦女的地位，其實這種文學與藝術的理想模式只是對現實女性的實際權力的剝奪和壓抑，說穿了也就是傳統基督教厭女症的發揮。[5]有趣的是，由於這本書的作者Bloch教授身為男性，所以他的同情女性的立場反而被曲解為大男人的錯誤視角，還因此受到了激進女性主義者的攻擊。

比起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學院裏的女學者們則用一種較平緩、較理論化的方式來進行研究，於是她們開始建立了一門新的「婦女研究」（Women's Studies）學科。以耶魯大學為例，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就有了該學科的設置，而且一直在美國校園裏佔有重要的地位。當初耶魯婦女研究的成功實與解構主義的興盛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有不少出色的女博士生和年輕的女教授利用「解構」的批判方式，把外頭正在流行的女權主義引入了學院的「中心」領域。後來這些女學者逐漸取得了學術成就和聲譽，並且把她們的研究方法推向了其他學科，其新穎的批評角度很自然地吸引了許多男性學者，使他們也開始嘗試用同樣的方法來考慮自己的專門學科，因而所謂的「婦女研究」也就逐漸地轉入了「性別研究」。這種包括男女兩性關係與問題的「性別研究」無形中助長了跨學科的研究，而且正如Mary Evans所說，它使得西方興起了一種「對知識本身的重新審視與組合」。[6]

但是，在美國漢學界，長期以來學者們都遵循著傳統的治學方法，只是在企圖尋找婦女在過去歷史中的聲音時，才偶爾借用了性別理論的方法。[7]可以說，開始之時，大家所採取的只是一種「考古」的性別研究方法。首先，胡文楷先生的《歷代婦女著作考》對我們這些在美國漢學領域裏做研究的人啟發特別大，它使我們驚喜地發現，原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傳統中國出版過更多的女詩人作品——僅僅在明清兩代，就

5 R. Howard Bloch, *Medieval Misogyny and the Invention of Western Romantic Lo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Mary Evans,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1997), 50~51.

7 Jinhua Emma Teng,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in the Western Academy: A Critical Review," *Signs,* vol. 22:1 (1996), 115~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版了三千種以上的女詩人選集和專集。因此，「五四」以來把中國婦女完全說成是封建禮教犧牲品的話語也顯得過於絕對化了。對於這些在她們的時代曾有過影響，也受過當時文人讚賞和支持的才女們，我們實在有為她們發揚光大的必要。何況若能讓西方讀者看到傳統中國曾有那麼多女作家寫過那麼多優秀的作品，這也是把中國文學提升到世界文學的經典地位的好方法。所以，一九九〇年由我和蘇源熙（Haun Saussy）發起，由六十多位美國的男女學者合作，開始了在美國漢學界算是前所未有的一件翻譯大工程，這就是龐大的《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一書的編選和翻譯的緣起。[8]藉著這個翻譯工作，我們無形中走進了世界性女性作品「經典化」的行列。

十多年以來，性別理論在美國漢學（尤其是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應用已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尤其在探討文學中的男性和女性「聲音」的主題上特別有貢獻。比如，Maureen Robertson研究明清閨秀詩人在她們的作品中如何通過對自己的表述，疏通了「德」與「才」的矛盾，並給自己塑造了一副德才兼備的形象，從而確立了婦女寫作的合法化。這就與Sandra M. Gilbert和Susan Gubar所著《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書中所剖析的西方女作家那種顛覆策略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另一方面，Ellen Widmer則從男女兩性共通的文人文化出發，同時強調了婦女如何組成她們自己的圈子，如她們的詩社和其他婦女事務方面的聯繫等。還有，Judith Zeitlin曾通過許多明清作品的細讀，討論女性與鬼故事之間的密切聯繫。此外，還有學者深入分析良家婦女和歌妓的對立存在，或通過大量的數據統計分析，指出明清女詩人如何在文人愛才的鼓勵下找到了自己的聲音——例如，我自己和李惠儀（Wai-yee Li）分別就明清歌妓的作品論述了她們如何「自我塑造」及其與文人文化之間的聯繫。[9]所有

8 Kang-i Sun Chang (孫康宜) and Haun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Maureen Robertson, Ann Waltner, Wai-yee Li, Judith Zeitlin, and Katherine Carlitz,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7), 171~217, 221~241, 46~73, 242~263, 101~130; Ellen Widmer, "Xiao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這些研究主題都已在一九九三年、我們在耶魯大學舉辦的「明清婦女與文學研討會」上提出討論。可以說，大家從一開始都是相當獨立地從各自關心的問題來思考性別含義的，只是到了後來，彼此才涉及到共同感興趣的題目。比如，至少有三位學者——方秀潔（Grace Fong）、康正果、Paul Ropp——都不約而同地討論了史震林《西青散記》一書中的農家才女雙卿其人及其詩詞，並就文人如何傳播才女的詩詞本事諸問題得出了比較一致的結論。[10]另外，Wilt L. Idema則在他研究朱淑真和張玉孃的文章中也探討了中國傳統的男性作者如何擬女性聲音的類似問題。[11]從這一聯繫出發，我和其他學者便對文人和才女同病相憐的邊緣性之文化含義有了更進一步的研究。[12]總之，在所有這些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中國文學裏，那種文人才女雙方「聲音」交相影響的現象。中國文人維護才女的現象實在很特殊，至少與西方傳統很不相同。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Jun. 1992), 111~155;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Kang-i Sun Chang, "Liu Shih and Hsü Ts'an: Feminine or Feminist?" in Pauline Yu ed., *Voice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69~187; Clara Wing-Chung Ho, "Encouragement from the Opposite Gender: Male Scholars' Interests in Women's Publications in Ch'ing China --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in Harriet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Boston: Brill, 1999), 308~353. 並參見拙著，李奭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10 Paul S. Ropp, *Banished Immortal: Searching for Shuangqing, China's Peasant Wom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Grace Fong, "De/Constructing A Feminine Ide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andom Records of West-Green and the Story of Shuangqing," in Widmer and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64~281; 康正果，〈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的詩意——西青散記初探〉，收入氏著《交織的邊緣——性別和政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171~202。

11 Wilt L. Idema, "Male Fantasies and Female Realities: Chu Shu-chen and Chang Yü-niang and Their Biographers," in Harriet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19~52.

12 Martin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6~98; 並見拙著，〈從文學批評裏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耶魯・性別與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207~2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對婦女及其聲音的強調，本身就挑戰了西方女性主義學院派對「別」（difference）這個字的原初界定。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間，標舉性別的區分乃女性主義批評家建立其理論陣地的主要策略之一。在我們所熟悉的英美學派中，Barbara Johnson（現執教於哈佛大學）首先主張「別」是解構男性偏見的最佳法門：她認為，強調男女之別可以促使讀者採用一種新的女性視角，糾正傳統的男性盲點，進而增進男女的平等地位。[13]其實Barbara Johnson自己當初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解構她在耶魯的男性師長——如Paul de Man, J. Hillis Miller, Geoffrey Hartman等人——的那種「大男人」的批評視角。[14]在這同時，Sandra M. Gilbert 和Susan Gubar則用更富形象性的「瘋女人」來指受男性中心文學壓制下的女作家們；由於性別的差異，這些「瘋女人」作者始終都被排斥在經典之外。[15]

至於被稱為「法國派」的女性主義學派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兩性之「別」——由於她們受了後結構主義和拉康（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所以她們更重視闡釋性別中的語言所起的本質差異，如拉康的女弟子Helene Cixous和Luce Irigaray便把婦女等同於「沈默」和「無言」，把女性寫作看成是一種「開放的、非線性的、未完成的、流動的、激烈爆發的和斷裂的」文體，她們認為女人有其女性的本質，而她們的書寫與她們的本質是一致的。[16]據這些法國的女性主義者看來，婦女之

13 Barbara Johnson,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0); *A World of Differ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7).

14 Barbara Johnson, "Gender Theory and the Yale School," in 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 eds., *Rhetoric and Form: Deconstruction at Yal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5), 101~112.

15 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 Christiane Makward, "To Be or Not To Be...A Feminist Speaker," trans. by Marlène Barsoum, Alice Jardine, and Hester Eisenstein, in Alice Jardine ans Hester Eisenstein eds., *The Future of Difference* (Boston: C. K. Hall, 1980), 96; Nina Baym, "The Madwoman and Her Languages: Why I Don't Do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in Robyn 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rev. eds., *Feminism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282, 2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所以不能被表述（represented），乃是因為她們本來就缺乏男性的「菲勒斯」（phallus）形式。就如著名的心理分析作家Julia Kristeva曾說：[17]

> 我看到「女人」身上有某種無法表述的東西，那是不可言說的……就其深層而言，就不存在女人一詞，在宇宙的存在中根本就沒有那樣的東西……

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許多早期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家所倡導的「性別差異」言論都很難適用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因為那些女性主義者往往將男女兩性置於完全對立的兩極。事實上，中國傳統的表述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比如男性文人都習慣在詩歌裏用女性的聲音說話（儘管常常有寄託的傾向，即所謂「男女君臣」），而女作家則喜歡模仿男性的文風，極力避免脂粉氣的傾向。這種男女聲音的置換有如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所以我曾將之稱為"cross-voicing"，因為在中國詩歌中所謂「聲音」往往是難以確定性別身分的。[18]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用「文化男女雙性」（cultural androgyny）的措詞來指這種傳統文化中的男女兩性均欲跨越性別區分的特殊現象。[19]從這一理解出發，這種「文化男女雙性」可以說是陰陽「互補」（complementary）的概念的發揮。但所謂「陰」和「陽」，其實不只是互補的兩面，因為其中的每一面都藉由改變和調整的過程在文化上提升了男性和女性。關於這個超越性別的觀念，許多漢學家都已經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例如，Roger T. Ames研究男女雙性觀念在中國古代道家的廣泛應用，Barbara E. Reed也對觀世音菩薩的由男身變女相做了十分有趣的探討。[20]最近，Charlotte Furth在她的新作《繁

17 Julia Kristeva, "Warnings," in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1), 136; see also Mary Evans,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Malden, M.A.: Polity Press, 1997), 49.

18 Kang-i Sun Chang, "What Can Gender Theory Do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ultures: China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Millennium," sponsored by The Swedish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dingo/Stockholm, Sweden, 5~9 May, 2000.

19 Kang-i Sun Chang, "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Cultural Androgyny," in *Tamkang Review*, 30:2 (Winter 1999), 11~25.

20 Roger T. Ames, "Taoism and the Androgynous Ideal," in Richard W. Guisso and Stanle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盛的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別問題》一書中通過陰陽互轉現象的討論揭示了雙性身體的性別意義。[21]Charlotte Furth特別提出，中國男女的身體都是陰陽互補的身體，因為男女兩性都分別是「陽中有陰」和「陰中有陽」的，這與西方醫學那種「單性」（one-sex）身體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對傳統中國人來說，性別之區分僅為身體的其中一個相對的因素，基本上男女的身體是同類的、互補的。比如說，在中醫的領域裏，男女的生殖器同樣被稱為「陰」，因為兩者都處於任脈的「陰」的部位，因而生殖的機能總是趨向陰的一面。只有再進一步劃分陰陽在人體的生殖機能時，才有所謂「男精」和「女血」的分別。此外，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傳統性別已成了一種隱喻，它象徵著天、地、人之間陰陽互相協調的宇宙秩序。[22]這樣看來，這個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陽互補觀正好可以用來解決「別」在西方性別理論中遇到的困境。如以上所說，當初女性主義者對「別」的強調當然在解決男女不平等的問題上是有作用的，但目前大家卻把「別」搞過了頭，因而已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問題。

應當指出的是，其實早在一九八〇年代，當男女兩極對立論剛被提出之時，就有女性主義學者自己提出過批評的意見。比如在〈瘋女人及其語言：我為什麼不搞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一文中，Nina Baym便大大地批評了所謂「瘋女人」和「女性語言」的發明，她認為那些標籤都是硬要搞「性別區分」所造成的災難：[23]

>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兩性不存在區別，我是擔心一旦「唯別是論」會讓「別」遮蔽了一切，而把這「別」再和厭女症掛上鉤，你就把女

Johannesen eds.,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Youngstown: Philo Press, 1981), 21~45; Babara E. Reed, "The Gender Symbolism of Kuan-Ying Bodhisattva," in José Ignacio Cabezon ed., *Buddhism, Sexuality, and Gender* (Ala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159~180.

21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51~154.

22 參見康正果所寫有關Charlotte Furth一書的書評：〈認識醫療和性別語境中的身體〉，收入劉東主編，《中國學術》2卷2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78~285。

23 Nina Baym, "The Madwoman and Her Language: Why I Don't Do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in *Feminisms,* 2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都逼得讓人覺得她們既不自然又很憋扭了……

顯然，Nina Baym認為，「唯別是論」會嚴重誤導性別的意義和兩性關係。而有關過分強調性別差異的危險性這個話題，又進一步被女性主義史學家Joan W. Scott提出，並作出了更深入的分析；她認為，死守「男女有別」的觀念會導致不必要的對立，所以她反對過分糾纏所謂「主體」的問題，反對把男女的對立主觀地歸結為性別的核心實質。她也承認，建立「主體」的概念是有發展前景的，但她還是擔心這一理論會導致以偏概全的後果。[24]後來Judith Butler的《性別煩擾》一書出版，人們更在其影響之下繼續對「唯別是論」提出挑戰。在這本備受稱讚的論著中，Judith Butler強調性別的問題其實只是一個角色問題，若死守角色就會成了角色的囚徒，一個人完全可以調整自己的角色扮演來改變傳統的性別模式。[25]

關於以上幾位女性主義學者對「唯別是論」派的批評，我們這些在美國研究漢學的人大都非常贊同。由於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們都認為性別身分表面上看來固然是恒定的，但也有其流動可變的一面。這樣一來我們就發現，西方性別理論學者和傳統中國研究學者雖在自己的領域中各有其新的研究心得，但對於性別的基本含義，我們還是最終達成了某種相近的結論，真可謂殊途同歸了。

除了糾正「唯別是論」的盲點以外，還有一種新的性別研究正在發展中——那就是，對女性的道德權力的重新思考。在西方性別研究的領域裏，耶魯大學的Nancy Cott也許是對通常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生活重新進行檢討的第一位批評家。一般人總以為在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由於普遍受到了性壓抑，她們完全成了男權制度下的犧牲品。但在她一篇題為〈毫無情慾〉（"Passionlessness"）的經典論文中，Nancy Cott卻強調當時女人最引以為傲的就是自己擁有的某種「家庭模範」之信念。正是由此出發，十九世紀美國的新英格蘭婦女就自然從她們共同信仰的

24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oan W. Scott ed., *Feminism an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2~180.

25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德母性」中得到了一種崇高的權威感。[26]換言之，這些女人並非如一般激進女性主義者所想像的「受害者」；她們在一定程度上，已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和權力意識。Nancy Cott這個發現和我的觀點不謀而合，因為在我的研究範圍中，我也同樣從中國古代女作家班昭身上看到，她的確從堅持她的閨範女誡中得到了特殊的道德力量感。[27]同樣，許多明清時代的寡婦也從自己的道德信念之中得到了某種權威感；她們常把自己比成高潔的青松，在歷盡寒霜之中，傲然不屈。[28]此外，有關中國女性的權力問題，漢學家Susan Mann對十八世紀盛清時期、文人文化中閨秀的研究也是發人深省的。Susan Mann從不同的方面描述了閨秀詩人構造其才德權威的新概念，同時她認為盛清時期的不少男性學者也藉著讚揚昔日的著名閨秀來批判當時社會的腐敗，而由此也提高了當時閨秀的地位，使她們不但更加意識到自己的道德力量，而且也使她們的學識贏得了普遍文人的尊重。[29]這個權力意識就是另一位漢學家Dorothy Ko稱之為「非官方的權力」，是傳統中國的婦女在其「內外相續」的世界中

---

26 Nancy Cott, "Passionlessn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Victorian Sexual Ideology," in *Signs,* 4:2 (1978), 219~236; Nancy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nd ed., xiii~xvii.

27 Kang-i Sun Chang, "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 in Theodore Hu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odations, and Critiqu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2. 有關班昭的道德感，參見Lily Xiao Hong Lee, *The Virtue of Yin: Studies on Chinese Women* (Australia: Wild Peony, 1994), 11~24.

28 見拙著，〈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1998），85~109。其他有關寡婦的研究，請見：Susan Mann, "Widows in the Kinship, Clas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Qing Dynasty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 (Feb. 1987), 37~56; Katherine Carlitz, "Shrines, Governing-Class Identity, and the Cult of Widow Fidelity in Mid-Ming Jiangnan,"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3 (Aug. 1997), 612~640.

29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 其他有關女性道德感的研究，可參見：Katherine Carlitz, "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Lienu Zhu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2:2 (Dec. 1991), 117~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享有的那個權威。[30]很多研究傳統中國文化的學者現在都開始認識到了這一權力概念，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當代西方批評中——特別是福柯（M. Foucault）——權力新話語的影響。事實上，福柯有關權力多向分布的說法已經在最近的性別理論上引起了革命性的變化。所以，早先那種給婦女派上一個「受害者」的預設形象便逐漸從九〇年代的女性主義批評中消失了。[31]福柯認為，「權力是自下而來的」，而且「權力關係在根本上並不存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完全的兩極分化或全面的對立」——所有這些論斷都啟發女性主義學者質疑了先前那種全面控訴父權制的理論模式。[32]當然，女性主義批評中曾一度流行的「受害者」理論之所以得到修正並不只是福柯的影響，其實受到湯姆遜（E. P. Thompson）《英國工人階級構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書影響的Nancy Cott自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就在強調指出：「別看婦女處處受支配，其實她們總在積極創造她們自己的環境。」[33]她認為不僅男人開創了他們的歷史，女人也同樣製造了她們自己的歷史。而且，任何社會及道德制度，若沒有女人的普遍參與和支持，也不可能一直存留下來。所以女人是歷史上的「參與者」，而非只是「受騙者」（dupes）。[34]

與Nancy Cott的看法很相近，漢學家Dorothy Ko也著重討論了婦女積極推動自己生活的現象。在她的《閨中教師》一書中，Dorothy Ko指出，Pierre Bourdieu有關男主外和女主內的劃分，是一個與福柯的非常規權力模式可資對比的理論，它確實有助於激發我們重新看待傳統中國的性別和權力關係。[35]由此出發，Dorothy Ko對儒家的「三從」作出了新的解讀，她發現傳統中國的婦女「極其善於在通行的性別體系內部給

30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 10~14.

31 有關福柯對女性主義的影響，見Mary Evans,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Malden, M.A.: Polity Press, 1997), 35~36.

32 Michel Foucault, trans. by Robert Hurley,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1978; Vintage Books, 1990), 94.

33 Nancy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xiii.

34 Nancy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xiii.

35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 Pierre Bourdieu, trans. by Richard Nice, *Outlines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1~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己製造空間，並從中給自己賦予意義，帶來安慰和尊嚴。」[36]她試圖重構17世紀中國良家婦女的各種生活面貌，這一點正可以補充Francesca Bray近年來有關婦女在日常用品創製方面的「權力編織」（fabrics of power）之研究。[37]還應提到的一點是，與在婦女與婚姻的問題上很有研究的歷史學家Patricia Ebrey相同，[38]Dorothy Ko和Francesca Bray兩人也都在她們的性別研究中特別關注因時、地、階級之不同而產生的各種變化。這樣一來，就不會產生以偏概全的盲點了。因此可以說，許多這些關於傳統中國的性別論著確實都更正了今日西方性別研究理論中的一種缺陷，即Joan W. Scott所謂婦女研究中所常見的「脫離歷史」的缺陷。[39]

性別和權力的另一個問題關涉到性意識（sexuality）和慾望（desire）。這一方面的研究最近幾年才在漢學領域起步。在其有關《紅樓夢》的研究中，余國藩（Anthony C. Yu）開啟了一個解讀小說的新策略，他引導讀者了解慾望「合法化」背後的動機和力量，而明清時期的男女正是藉此挑戰了傳統的規範。[40]在出版略早的《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一書中，我也曾就明末文人才女在詩詞裏的情觀和慾望作了詳細的討論。[41]Bret Hinsch則在其《斷袖之情》一書中介紹了中國古代男人同性戀的種種——另附女同性戀的討論。[42]另外，李惠儀則在其《入迷與解惑》一書中為我們揭示了中國文學愛情譜系中豐富多彩的內容，她

36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 8~9.

37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8 Patricia Ebrey, "Women,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in Paul S. Ropp ed., *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97~223.

39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165.

40 Anthony C. Yu, *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82~109.

41 孫康宜著，李奭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原文見Kang-i Sun Chang, *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2 Bret 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詳析了神女形象所體現的慾望之虛幻力量，解釋它最終如何使男性的戀慕者得到了精神上的完成。[43]但另一位學者Keith McMahon的方向則有所不同，他就傳統的「才子佳人」婚姻——對偶的或多妻的——主題，剖析了慾望的「理性主義」表現。[44]如果說以上幾位學者重點探討了情的力量，近來出版的很多新的著作則轉向了慾望的危險性。例如，最近Matthew H. Sommer曾就清代的情色案件與法律的關係作了嶄新的研究，深入探討了兩性之間由情慾而引起的各種危害性。[45]此外，還有幾位漢學家也關注到女性慾望的禍害。例如，William Nienhauser指出，很多唐人傳奇都表現了女性性慾「固有的危險性」，這就說明了為何男人總希望用「雙重標準」來控制女人的原因。[46]在《危險的女人》一書中，Victoria Cass則試圖發現某些邊緣女性人物的聲音，其中包括那些以色事人的歌妓。[47]這一獨特的論題，可謂回應了Gail Hershatter描述近代上海賣淫業的一本新書中所說的「危險的享樂」，[48]儘管其側重點非常不同。顯而易見，在近來眾多的中國文學和文化方面的論著中，這些重構慾望話語的嘗試都使我們不得不以新眼光重解傳統文學。[49]

另一個與慾望問題密切相關的主題是重新發現女性主義話語中的女性身體。早在一九八〇年代，美國女性主義詩人Adrienne Rich就說，通常人們總是把女人同其身體分割開來。她對這樣的傳統觀念極為不

---

43 Wai-yee Li, *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44 Keith McMahon, "The Classic 'Beauty-Scholar' Romance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Talented Woman,"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27~252.

45 Matthew H. 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6 William Nienhauser, Jr., "Female Sexuality and the Double Standard in T'ang Narratives: A Preliminary Survey," in Eva Hung ed., *Parodox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0.

47 Victoria Cass, *Dangerous Women: Warriors, Grannies and Geishas of the Ming*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48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49 有關這一方面的討論，見康正果，《重審風月鑑》（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滿，因此迫切呼籲女性「應當重新擁有自己的身體」：[50]

> 我們女人一旦重新擁有自己的身體，將會給社會帶來比工人掌握了生產資料還要本質的變化。女性身體既是領地又是機器，既是有待開發的處女地又是生產生命的流水線。我們需要想像一個每個婦女都能充分把握其個人身體天生能力的世界。

在此，我們可以把Adrienne Rich的「女人身體能力論」視為女性主義把知識等同於權力的普遍傾向。在很多女人看來，認識自己的身體，以及把個人的身體從男人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就是一種權力的形式。這也可以說明整個八〇年代有關女性身體的女性主義寫作突然增多的原因。正如Mary Evans在她一本談女性主義思想的書中醒目地指出：「認識我們的身體是我們任何一個女人都首先熟知的知識，所以說這個身體和對它的發現在女性主義文學中具有根基的地位。」[51]由此可見，女性身體話語的感染力在於它始終強調重新識自我，從而也認識個人的主體性。

但一九九〇年代以來，隨著婦女研究的重點逐漸轉向性別研究，女性身體的問題也就隨之轉向對男女兩性身體的普遍關懷，特別是涉及性別身分是如何與身體的性徵有關的問題。在今日漢學界，有關性別和身體之間的研究探討，最有貢獻的學者大多不在純文學的領域中。這一方面尤其以研究醫學和歷史的專家最引人注目。這一類的題目會使人想起黃俊傑和楊儒賓等學者所研究的「身體政治學」，[52]只是它們對身體的定義更為具體，而且總是涉及性別的話語。如前所述，Charlotte Furth的新書《繁盛的陰》在介紹傳統中國男女身體獨特的作用之同時，也讓我們對男精女血的協調互補以及陰陽雙性的身體模式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同時，Furth強調女性崇高而神聖的生育能力，就因為那個蓄息後

---

50 此段引文請見Janet Sayers, *Sexual Contradictions* (London: Tavistock, 1986), 42; 並參見 Mary Evans,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51.

51 Mary Evans,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50.

52 黃俊傑，〈中國古代思想史中的「身體政治學」：特質與涵義〉，《國際漢學》第4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200~218；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的神聖力量，使得身體上的母性被提升到了偉大母親的社會地位——於是那些母親年老的時候在家裏就有了特權（頁307）。基於這個基礎，Charlotte Fruth批評了西方女性主義者把性慾和生育分隔的做法，以及她們把性別身分的意義過於情色化的傾向。[53]所以她在書的結尾處說道：「我要引導讀者想像性地接觸那陌生化的文化身體，瞭解與其相關的中國歷史以及另一種性別建構方式……」（頁312）[54]在此，應當提到的是，另一位漢學學者Francesca Bray也在其近作中試圖重申中國人對身體的不同理解，她也強調了母性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重大意義。[55]正是中西文化對身體構成的「不同」這一概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意義之改變，證明中國研究領域內的學者可作的有趣探討是十分廣泛的。比如，Angela Zito和Tani E. Barlow編了一本名叫《身體、主體和權力在中國》的論文集，我發現其中有很多富有啟發性的文章從人類學、歷史、文學和藝術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中國文化的身體表述問題。[56]其中藝術史家John Hay的文章特別富有洞察力，他發人深思地談到了中國繪畫中少有裸體的問題，這一現象正與裸體在傳統西方繪畫中占有中心地位的現象形成了尖銳的對比。[57]也是因為古代的中國人從來就沒有把裸體當成藝術來欣賞，也沒有把裸體視為一種人體美。或許那些園林中的奇石對傳統中國人來說還更富有美感。其實據巫鴻（Wu Hung）多年以前對中國美女的研究，通常這些女人的住處、庭院、用品、服裝要比她們的顏面之美重要得多。[58]現在John Hay再次強調，中國藝術中的情色意味一向體現於服飾，而其文化含義特別重要。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從古代中

53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311.

54 此段為康正果的譯文。見康正果，〈認識醫療和性別語境中的身體〉，《中國學術》2卷2期，285。

55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301.

56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57 John Hay, "The Body Invisible in Chinese Art?"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43~47.

58 Wu Hung, "Beyond Stereotypes: The Twelve Beauties in Qing Court Art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306~3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人的觀點看來，穿戴在身上的服裝和裝飾——尤其是那些緊貼著肉體的腰帶、繡花鞋等——還更能引起人們對女性美的聯想。[59]這就把我們引到了另一個題材的研究——那就是有關古代婦女纏足的問題。在漢學研究的領域裏，纏足是個老問題，而早在一九六六年Howard Levy已經出版了他那本有關纏足史的書。[60]但一直要到最近幾年，學者們才開始從性別研究的觀點來重新闡釋女性的纏足問題。例如，王屏（Wang Ping）在她剛出版的《美麗的受苦》（Aching for Beauty）一書中，把纏足視為古代中國男女共同的慾望之特徵，它也是婦女神祕語言的文化體現——不能只把它視為一種男權的壓迫。[61]另一位研究明清史的學者Dorothy Ko則正在著手撰寫一本題為《纏足即歷史》（Footbinding is History）的專著；她準備從社會史、身體觀、和器物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新觀點來重新探索纏足的問題。[62]此外，香港中文大學的Eva Hung教授，最近曾在一篇極為深入的文章裏討論到婦女纏足的問題。一般人研究這個題目，總是強調纏足的弊害及其改革的必要，然而，Eva Hung卻注意到民國初年一些已經纏足了的婦女「被迫」還原到天足的苦楚；在這一段過度期間，這些婦女不但受到人們普遍的歧視，也受到了肉體的折磨

---

59 見康正果所寫有關John Hay一文的評論：〈裸體像和赤裸〉，收入氏著《身體和情慾》（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2~15。

60 Howard Levy, *The Lotus Lovers: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Curious Erotic Custom of Footbinding in China* (1966; reprinted Buffalo, N.Y.: Prometheus, 1992).

61 Wang Ping, *Aching for Beau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62 參見Dorothy Ko有關纏足的幾篇著作："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Bound Foot: A History of the Courtesan's Aura,"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74~100; "Bondage in Time: Footbinding and Fashion Theory," in *Fashion Theory: The Journal of Dress, Body & Culture*, 1:1 (Mar. 1997), 3~28; "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in *Journal of Wonen's History,* 8:4 (Winter 1997), 8~27; "Rethinking Sex, Female Agency, and Footbinding," in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7 (Aug. 1999), 75~105; "The Sex of Footbinding," in Radhika Balakrishnan, Mary E. Hunt, and Patricia Beatrice Jung eds., *Good Sex: Women's Religious Wisdo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蓋纏足一旦從裹足布中釋放開來，則痛苦萬分，寸步難行。[63]Eva Hung的觀點十分新穎，相信她所提出的問題一定會引起進一步的比較研究。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目前的文學史、藝術史、醫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學科所持的嶄新的性別觀都對傳統中國文化的研究產生了舉一反三的效果。尤其是，性別研究在漢學研究中的應用顯然已挑戰了傳統的文本閱讀。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都開始把大量的精力花在涉及到性別關係的課題上。但這一學術領域還需要持續的耕耘，如果我們把性別理論和傳統中國文化視為兩個相關的知識領域，那麼我們不僅要進一步探求兩者如何相關，而且要弄清那個關係如何成為一種文化構成。問題是，我們總誤以為只有西方批評理論會帶給中國文學研究一個新視角，卻忘了中國文化也可以影響西方。在他的《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一書中，張隆溪曾一針見血地點出：「我們如果以為理論的挑戰只是來自西方理論的一種外部壓力，那就錯了。」[64]我以為，今日研究漢學的學者們，在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特色之同時，他們更應當努力顯示中國研究到底能給西方甚至全球文化帶來什麼樣的廣闊視野？如何才能促進東西文化的真正對話？怎樣才能把文化中的「不同」（difference）化為「互補」（complementarity）的關係？最近，在他的有關全球化文化的作品中，著名的評論家Fredric Jameson曾經特別指出，大家在有關女性主義的全球化一事上仍做得不夠。[65]實際上，正如本文所示，目前西方的漢學研究已給性別研究帶來了空前的震撼性之挑戰，但這一點還有待雙方面的學者進一步的交流。一般說來，無論是臺灣或是大陸的性別研究都有「全盤西化」的缺點，常常不假思索地套用西方理論，以為只要是西方的理論，一定是愈新愈好，於是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解讀也變成

63 Evan Hung, "Through A Glass Darkly: Footbinding and the Woman Question,"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ultures: China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Millennium," sponsored by the Swedish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dingo/Stockholm, Sweden, 5~9 May, 2000.

64 張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閉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56。

65 Fredric Jameson, "Preface," in 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v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西方理論公式的重覆借用。反而是西方的漢學家們更能站在傳統中國文化的立場，會用客觀的眼光來對現代西方文化理論進行有效的批評與修正。我認為有深度的「批評與修正」將是我們今日走向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有力挑戰。

*本文曾發表於第二屆「中華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新意義」研討會，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與美國史丹福大學合辦，2001年4月。

（責任編輯：鄭雅如　校對：李奇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